

经济讲堂

理论驿站

新发展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升华

□ 顾海良

在我国将进入新发展阶段的历史节点上,习近平总书记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事业发展战略全局的高度,以辩证思维看待新发展阶段的新机遇新挑战,从以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为主构建新发展格局,以科技创新催生新发展动能,以深化改革激发新发展活力,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以共建共治共享拓展社会发展新局面等方面,对新发展阶段我国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作出系统阐释,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经济关系的发展及其趋势作出深入探讨,促进了新发展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升华。

把握政治经济学对象的历史性特征, 升华新发展阶段政治经济学的辩证方法和战略思维

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这不仅因为它所涉及的是历史性的即经常变化的材料,也因为它所研究的总是一定历史阶段变化的经济关系和经济过程的趋势和特征。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对“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交替节点的历史变化及其趋势作出准确判断,深刻把握了新发展阶段政治经济学的内在规律。

我国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发展前景总体向好。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推进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中,在经济结构优化、质量提升、效益升级、动力变革等方面,已经取得明显成效和突破性进展。特别是在面对各种经济风险和周转速度的困难挑战中,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具有更强大的应对定力、经济实力、创新活力和抗风险能力。但是,在经济发展中也存在诸多矛盾和问题,其中有的是多年来以经济领域结构性矛盾、体制性症候和周期性变化交互作用造成的,也有的是当下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造成的。特别是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循环和周转受阻,整个经济社会活动受到冲击;同时,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当今世界正经历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变化,世界经济低迷,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因非经济因素而面临冲击,一些国家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上升,国际经济、科技、文化、安全、政治等格局发生急剧动荡和深刻调整。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的:“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将面对更多逆风逆水的外部环境,必须做好应对一系列新的风险挑战的准备。”

虽然我国经济发展面临严峻的风险考验,但我国制度优势显著,物质基础雄厚,人力资源丰富,市场空间广阔,经济潜力足、韧性强、回旋空间大;我国社会大局稳定、治理效能不断增强,政策工具箱的基本特点并没有改变,经济发展的“大局”依然在掌控之中,谋“大势”、成“大事”的改革和发展动力依然强劲。要辩证分析和全面理解国内外大势,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就要深刻把握和充分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新特点和新要求,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新发展动能、新发展活力、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社会发展新局面,着力“育新机”“开新局”,一切问题就能迎刃而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辩证方法和战略思维,成为新发展阶段政治经济学理论升华的显著标识。

把握新发展阶段经济运行, 升华新发展阶段政治经济学的总体视域和境界

无论是“育新机”还是“开新局”,都要牢牢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基本特征和根本要求,以解决和处理好社会主要矛盾为枢纽。

以此为枢纽,必然凸显以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为主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性。在新发展阶段,随着外部环境和我国发展所具有的元素禀赋的变化,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国际大循环动能明显减弱,而我国内需潜力随着“美好生活”满足程度的逐步提高而不断释放,提升日益强劲的国内大循环活力,成为解决好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方面。

以此为枢纽,还必然凸显以共建共治共享拓展社会发展新局面的必要性。在新发展阶段,适应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社会行为方式、社会心理等深刻变化,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健全全覆盖、可持续的社保体系,强化公共卫生和疾控体系,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加强社会治理,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成为处理和解决好社会主要矛盾的现实基础。

无论是“育新机”还是“开新局”,都有一个如何处理好经济运行总体和环节之间关系的问题。马克思在对政治经济学对象阐释时提出,“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而“生产就单方面形式来说也决定于其他要素”,“它们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习近平总书记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赋予马克思这一理论以新的时代意蕴。

在经济运行上,要着力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在总体上形成更多的新的增长点、增长极,以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为主构建新发展格局。要防止从经济运行的单一

环节或局部过程看待发展问题,也要避免按一时的经济变化静止地或片面地判断经济走势。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扭住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增强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更多地依托国内市场,全面开拓新发展阶段中“育新机”“开新局”的新优势和新路向。

总结经济学说的历史发展, 升华新发展阶段“系统化的经济学说”新内涵

“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是2015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提出的重要论述。当时习近平总书记对“系统化的经济学说”首次作了概括,提炼和总结了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包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新的发展理念、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分配制度、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和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等方面的主要内容。

2017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在实践中形成了以新发展理念为主要内容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可以说,这是对“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再度作出概括,提出了坚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坚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坚持适应我国经济发展主要矛盾变化完善宏观调控,坚持问题导向部署经济发展新战略,坚持正确工作策略和方法等七个“坚持”。这一概括是党的十八大至十九大这五年间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理论凝练。

习近平总书记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再次涉及了“系统化的经济学说”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及时总结新的生动实践,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在发展理念、所有制、分配体制、政府职能、市场机制、宏观调控、产业结构、企业治理结构、民生保障、社会治理等重大问题上提出了许多重要论断”。这些重要论断,实际上就构成了“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学术和学理基础。

在对“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新概括中,习近平总书记除了对之前形成的一些重要理论作了新的概括,同时还对新的理论作出概括,如,关于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理论,关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理论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些理论成果,不仅有有力指导了我国经济发展实践,而且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这些概括,也是习近平总书记深入研究我国经济和世界经济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结合新特点新规律,对新发展阶段政治经济学“中国智慧”的理论升华。

明确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指向, 升华新发展阶段政治经济学的思想智慧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对新发展阶段要发展什么样的政治经济学和怎样发展政治经济学的重大问题作了阐释,升华了新发展阶段政治经济学的思想智慧和学理依循。

一是要从国情出发,从中国实践中来、到中国实践中去,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使理论和政策创新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来就主张“从当前的国民经济的事实出发”,即从实际的和现实的经济关系和经济问题出发。面对新发展阶段极其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和纷繁多样的经济现象,我们更要关注经济实践、投身经济实践。新发展阶段政治经济学要立足于我国国情和我国经济改革发展的实践,归根到底是对这一实践中积累的经验教训和理性认识的深化。

二是要深入调研,察实情、出实招,充分反映实际情况,使理论和政策创新有根有据、合情合理。在新发展阶段,以科技创新催生新发展动能是“育新机”“开新局”的关键所在。如何形成新发展动能,如何实现依靠创新驱动的内涵型增长,就有一系列理论和政策问题需要解决。特别是大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在关键核心技术上尽快要有实质性突破的问题,还需要在察实情中出新招,还需要有理论创新和政策创新。这些就是新发展阶段政治经济学发展的课题指南和路向。

三是要把握规律,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透过现象看本质,从短期波动中探究长期趋势,使理论和政策创新充分体现先进性和科学性。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根本上就是要掌握科学的经济分析方法,认识经济运行过程,把握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力,提高领导我国经济发展能力和水平,更好回答我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合理成分。对国外特别是西方经济学,我们要坚持去粗存精、去伪存真,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对其中具有意识形态色彩的内容,不能照抄照搬。在新发展阶段,要坚持大讲特讲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四是要树立国际视野,从中国和世界的联系互动中探讨人类面临的共同课题,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经济全球化仍然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潮流,国际经济联通和交往仍然是世界发展的必然趋势,各国分工合作、互利共赢仍然是人类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的内在要求。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和方案,是新发展阶段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课题,也是新发展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升华。

(作者系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研究员)

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的变化而提出来的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习近平总书记前不久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指出,“未来一个时期,国内市场主导国民经济循环特征会更加明显,经济增长的内需潜力会不断释放”。之前,习近平总书记曾在企业家座谈会上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是关起门来封闭运行,而是通过发挥内需潜力,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联通,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更加强劲可持续的发展”。这就告诉我们,加快形成新发展格局,内需挖潜是关键。

需求是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在我国的需求结构中,过去曾经长期存在经济的外贸依存度比较高的问题。近年来,随着外部环境和我国发展所具有的元素禀赋的变化,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国际大循环动能明显减弱,而我国内需潜力不断释放,国内大循环活力日益强劲。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我国经济已经在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转变,国内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有多个年份超过100%。这次疫情期间,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数字经济等作为稳投资、扩内需的重要途径,对形成新的增长极、拉动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实践证明,扩大内需是进一步激发经济活力、积蓄发展动能、对冲世界经济下行风险的必然要求。为此,应在以下几个方面下更大功夫,想方设法发挥内需潜力,把超大规模内需市场转换为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畅通国内大循环,加快形成新发展格局。

着力提高居民消费意愿和能力。从根本上说,扩大内需就是要在既定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下提高消费能力,以消费拉动需求。内需的基础在收入、在就业。没有就业、没有收入,内需无从谈起。提高消费在内需中的比重,重点在于增加居民收入,让“钱袋子”鼓起来,改善居民消费预期,让消费者更加“能消费”。要通过稳就业、促增收、保民生和提升消费品质量、优化消费环境,使被抑制和冻结的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促进消费提档升级扩容。同时合理增加公共消费,稳定总体消费水平。中等收入群体是我国最具有消费潜力的群体。这部分群体受过良好教育,工作稳定、收入相对较高,针对这一群体的消费能力、消费特征以及制约其消费的因素进行合理引导,破除消费制约因素,把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潜能充分释放出来。低收入群体边际消费倾向大,物质需求旺盛,重点应提高这一群体的物质保障水平,满足其基本物质需求。

设计有利于促进消费的政策安排。建立合理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收入分配制度和产权制度是消除制约和抑制消费的因素的关键。要构建完善的社保、医疗和养老保险制度,从根本上消除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要继续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优化收入分配结构,倡导勤劳致富、支持创新创业、保护合法经营,普遍提高人民富裕程度,通过采用转移支付等方式,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消费水平。建立健全促进农民收入较快增长的长效机制,提高农民消费能力,激活农村消费市场。同时,还要全面营造放心消费环境。严厉打击各类侵犯知识产权和消费伪劣商品等违法犯罪活动,积极推进消费领域信用体系建设,有效保障物消费者的投诉维权渠道,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推动提振消费与扩大投资有效结合。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我国内需潜力大,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突出民生导向,使提振消费与扩大投资有效结合、相互促进。”一方面,要持续扩大国内需求,克服疫情影响,扩大最终消费,为居民消费升级创造条件。另一方面,要着眼长远,积极扩大有效投资,健全市场化投融资机制,鼓励社会资本参与,让投资持续发挥效益。这方面的工作包括: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新一代信息网络,拓展5G应用,建设数据中心,激发新消费需求,助力产业升级;深入推进重大区域发展战略,加快国家重大战略项目实施步伐;以新型城镇化带动投资和消费需求,推动城市群、都市圈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创新,大力提升县城公共设施和服务能力;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支持管网改造等,发展居家养老、用餐、保洁等多样社区服务;等等。总之,实施扩大内需战略,要在充分发挥消费基础性作用的同时,发挥好投资的支撑作用。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在全面分析国内经济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治本良药,也是解决我国发展中突出矛盾和问题、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工作主线。供给与需求对立统一,相互依存,互为条件,新的需求可以催生新的供给,新的供给可以创造新的需求。着力扩大国内需求,必须坚定不移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努力推动供给体系更加适应国内需求,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更多依托国内市场,发挥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作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要引导企业创新产品、服务和供给模式,以多样化、高品质和高附加值的产品满足市场需求。要培育发展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激发数字消费潜能,大力推动线上线下消费融合。要针对不同消费群体的消费能力、消费习惯、消费特征、消费偏好,提供与之相适应的产品,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同时,还要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提高供给质量,改善供给结构,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创新适应新需求的有效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推动产业链再造和价值链提升,实现供需的匹配和动态均衡。

因势而谋,顺势而为,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战略方向,扭住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进一步发挥内需潜力,将会有效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加快形成新发展格局。(作者系中央党校报刊社《学习时报》编审)

内需挖潜是形成新发展格局的关键

□ 李步前

新书印象

讲好中国抗疫故事 更加坚定“四个自信”

□ 姜辉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人类的生产生活造成重大冲击,影响了人类发展进程,也重塑了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在这场人类大难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得到实际验证和有效传播,中国制度优势得到充分体现和广泛赞誉。面向全球讲好中国抗疫故事,是当前中国舆论界文化界的重要任务。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这场大考,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全面加强疫情防控的集中统一领导,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首位,形成了中央统一部署、上下联动的防控救治体系,举全国之力有效控制了新冠肺炎疫情在国内的蔓延,书写了中国制度、中国速度、中国精神新篇章,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最大优势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

心战“疫”的磅礴伟力更加彰显。经过这场大考,广大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和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有了更加深刻的体悟,更加坚定“四个自信”,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更加充满信心。

纵观人类发展进程,始终交织着与全球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抗争。在全球化不断深化的今天,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给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全球化时代如何应对疫情?这是对国际合作的重大考验。新冠肺炎疫情能否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更加有效的控制,取决于世界上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能否以团结消除分歧、以理性消除偏见,凝聚起团结合作、共同应对疫情的强大合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人类是一个命运共同体。战胜关乎各国人民安危的疫病,团结合作是最有力的武器。

随着疫情的蔓延和扩散,一些西方国家治理乱象百出,社会撕裂和动荡日益加剧。为了给自己的抗疫不力脱责,一些西方政客忙于“甩锅”、肆意“污名化”中国,公开挑战中国抗疫取得的巨大成就。事实胜于雄辩,中国抗疫的效果是对负面舆论和歪曲偏见的最有力回击。

指示精神和党中央的统一部署,我国在不断完善国内防控救治体系的基础上,积极推进疫情防控国际合作,向世界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派遣医疗队、援助医疗物资,与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社会分享抗疫经验,努力在国际联合抗疫贡献中国力量。在疫情面前,中国始终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守望相助、共克时艰,充分彰显了大国担当、大国风范,展现了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新冠肺炎疫情引发了国外学术思想界的高度关注。国外不少人士围绕疫情深入思考一些重要理论和现实问题,比如,如何全面客观地认识中国的抗疫表现?如何解释一些国家在抗疫行动中出现的分歧?如何看待疫情对世界格局的影响及其未来走向?如何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促进全球抗疫合作?……提出了不少既具有国际视野和理论思维又富有针对性和前瞻性的真知灼见。

为了充分反映这些思想观点和研究成果,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部共同进行课题攻关,采访了20余位国外政治家和学者,邀请他们就相关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和探讨,从不同视角撰写了原创性文章。同时,为了能够更广泛、充分地反映近年来国际学界在疫情问题上的认知状况,课题组还从已刊载的文章中有重点地摘编了一些重要观点,并从中

层面对外最新观点进行了综述评析,以此为基础,编纂形成《中国战“疫”的国际贡献和世界意义——国外人士看中国抗疫》一书。

作为集中反映国外对新冠肺炎疫情分析和研究的著作,本书具有如下几个特点:一是撰稿的专家学者地域分布范围较广,来自欧洲、亚洲、北美、拉丁美洲等世界多个地区,涉及意大利、西班牙、德国、美国、英国、捷克、日本、巴西、奥地利、印度等17个国家,具有一定的地域代表性。二是本书专访的学者长期身处资本主义国家,部分人多次访问中国或曾旅居中国,或者是长期从事中国问题的专家。因此除了具备专业的学术背景外,无论对中国还是其所在国的情况,他们都有着深刻的体认和真切的两相比照。三是撰稿人都具有较强的问题意识和导向,所阐释和分析的内容大多为疫情下引发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尤其从疫情下全球“两制”比较、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等视角出发,撰稿人提出了许多客观公正、科学严谨、发人深省的见解和观点。

希望这些分析和思考能够帮助人们正确认识当前中国和世界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斗争,能够让更多的人真正了解中国的抗疫故事,能够对进一步加强合作、增进共识、携手应对疫情有所助益。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执行主任)